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三二期 ——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10d)

【书刊评论】《“文革”造反派真相》序	宋永毅
【上访申诉】云南“揭批查”中的大冤案	周金昌
【亡灵祭坛】卞仲耘纪念会在京举办	佚名
【春秋史笔】刘源和父亲刘少奇	金钟
【难忘岁月】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 (之八)	刘光耀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书刊评论】

《“文革”造反派真相》序

• 宋永毅 •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三十余万字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不仅仅是目前为止的由大陆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有关文革造反派研究的著作，而且是一本很有份量的学术专著。我在这里之所以强调这是一本学术专著，是因为造反派问题和文革中的许多问题一样，在文革爆发四十年后已经在客观上成了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历史对象，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翻案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及其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造反运动卷入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决不是用非黑即白的中共的“阶级分析”的套路——无论是说造反派是“好”还是“坏”——可以说得清楚的。可喜的是，我们在这本专着中看到不仅是周伦佐先生追溯历史真相的执着，还看到了他评析研究对象的客观和冷静。因为对文革造反派问题的研究尚还处于一个起步状态，周伦佐先生的一些方法和结论可能未必一定会被读者和同行所全部认同，也当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任何学术见解都不可能是追寻真理的终极点。有时候，起点上的踉跄的足迹远比以后坚厚脚印来的可贵——如果没有难能可贵的播种，就不可能有未来的黄金丰收。

诚如周伦佐先生指出的：造反派在今天已经被完全妖魔化了。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恐怕“造反派”已经成了文革罪孽的两个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上层是“四人帮”，下层则是“造反派”。在某种程度上，造反派成了诬陷、阴谋和暴力的抽象代名词，承担着文革中所有罪恶的大半责任——因为在人们的记忆中，即便是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最终也是通过他们的造反派“爪牙们”去具体执行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类错误的历史记忆并不是发生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一代的脑中，相反却大多是在文革的亲历者身上；而这些亲历者们，又大多是文革后话语权的主要掌握者，例如中共老干部、社会名流、教授学者乃至今天的文革研究者。他们的回忆录，控诉书乃至研究文章都不约而同地助长了这一错误记忆的广为流传。周伦佐先生在他的专著中用不小的篇幅提出了上述的集体失忆现象。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为造反派“平反”的政治诉求，更不是要掩盖文革中造反派组织及其个人确实参与了的任何错误和罪恶，而是表明我们今天严肃的历史研究的态度：对造反派和文革中的任何历史派别和现象，既不能美化，也不能丑化，更不应当简单地妖魔化。历史，尤其是文革这样风云际会、瞬间变幻的历史事件是极其复杂的。而澄清历史真相，纠正流行的记忆偏执却正是我们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对于这一集体失忆的描述和澄清，周伦佐先生的专著已经从现实和历史两个角度作了大量的论述，因而我也就不再赘说。但是我这里还想谈一下这一集体失忆现象的原因和另外一场对造反派不公的中共的政治运动——“清查三种人”。这些可能因为周伦佐先生作为一个身处大陆内地的学者，许多新的信息和材料还是不太能及时得到的。

追溯上述错乱的集体记忆，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其一是一些在1966年运动初期就被打倒的社会名流，因为长期身处“牛棚”，对“桃花源”外的群众运动已经分不清什么“造反派”，“保守派”和“专案组”。因为文革结束后的主流媒体上对“造反派”的一片讨伐之声，自然也就把整他的“革命群众”和“专案人员”也当作了“造反派”。不少文革前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他们晚年回忆录中的混淆，大概都属于这一类的错误。其二是一些中共老干部和社会名流，虽然心知肚明整他们的其实是毛泽东或刘少奇为代表的“党中央”，但又无法向最终又带给了他们荣华富贵的“党”发作，心中又对文革中批判过他们的群众有气。便就自然地紧跟党已经定下的官方口径，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在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头上。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文革后官方舆论误导的结果。1976年10月以后的中共，尤其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执政的中共老官僚集团，既不想否定文革实际上最大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又不想承认造成文革的制度性的原因（比如承认他们都曾经发动文革的支持者）——其逻辑结果就必然要积极寻找替罪羊。在中共上层，当然是林彪和“四人帮”；在社会下层，就是“造反派”。这里仅举一例便可以借一斑而观全豹：如果你检索一下自1976年10月到1983年的《人民日报》，便会发现竟有260篇把“造反派”作为文革最大的罪孽来批判的社论和理论文章。至于把“造反”作为一个罪恶的公共贬义词的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换句话说，在中共的中央党报上，每天便至少有一篇丑化造反派的文章，更遑论数以千计的地方性的官方报刊、电视电影里对造反派描述的简单化和脸谱化了。

论及官方对造反派问题的蓄意误导，就不能不提及在1976年年底后全国范围内的“揭、批、查”“四人帮”帮派人物的运动，和1980年到1982年中共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期间，审判了百余名在全国范围内较为著名的造反派领袖的事件（如果连同地方的审判，恐怕至少有数万人之多）。毋庸讳言，这些人中确实有一部分积极参与了“四人帮”的帮派活动的，如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也确有一些是触犯了刑律的坏人。但是，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中共老官僚集团侧重要清算的却主要是他们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为”，乃至明眼人一瞥间便可以洞悉这些中共老官僚的公报私仇的阴暗心态。例如，被判重刑的不少人只是学生造反派的领袖，例如北京的“五大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和谭厚兰。其中除谭厚兰因癌症后期而没有起诉外，其余四人一律被判15至17年不等的重刑。毫无疑问，

这些“领袖们”在文革中都犯有极大的错误、有的甚至是罪行。但对比判他们的重刑和起诉他们的罪名，却令人啼笑皆非。例如，在对他们的“起诉书”和“判决书”里，人们都可以读到他们在文革初期（1966—1967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重要罪责。而一个简单的历史常识却是：在文革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只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号召“造反”。而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陈云，都是这个党中央的一员，都是对发动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投了赞成票的！另外，1979年中国便有了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新的《刑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本法自一九八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施以前的行为，如果按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使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毫无疑问，造反在文革初期完全是一种合法行为，完全无罪可定。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刑法》中还明确规定了追诉的“时效性”。在中共1982年起诉他们1966—1967年的造反行为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3—14年，其实已经没有了法律上的追诉的“时效性”。而这些学生造反派领袖其实从1968年起便被毛抛弃，自当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长期处于被监禁状态。他们根本没有也无法和70年代中后期才形成的“四人帮”的活动有什么关联。

邓小平等人对他们的定罪还带有很大的私人挟嫌报复的阴暗心理。例如，在对聂元梓的起诉和定罪中特别突出了她对当时的北大学生，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和女儿邓楠的迫害。事实上，聂并没有参与任何直接的迫害活动，只是在1967年1月全国第一个写大字报要打到邓小平的人。而邓的儿子邓朴方在文革初期，也还是一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曾经策划过在北大的高干子女中组织类似“红卫兵”的秘密组织“贫协”，鼓吹“高干子女掌权”论，也担任过系里的文革委员。他的被抓和在自杀中摔坏了腿其实和下面的派性斗争有很大关联。邓小平无法找到和追究和他儿子自杀的直接有关者的刑事责任（因为是自杀而不是他杀），便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倒了其实与此事无关的，但公开写过大字报要打到他的聂元梓的身上。可见他个人的挟嫌报复的阴暗心理和作为一个政治家气量的狭窄。

更为严重的是，自1976年开始的在省市大抓“四人帮”黑干将、黑爪牙的“揭、批、查”运动，在不少两派斗争本来就严重存在的省市迅速地演变为一场专门针对造反派的新的“清理阶级队伍”。成千上万的参加过造反的群众又一次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这便使得这一政治运动失去其合法性，而又一次坠入“翻烙饼”式的派性的泥潭。1982年7月4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是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尽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接着，他又提出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大抓牛鬼蛇神，1967年武汉军区搞所谓的“镇反”一夜抓成千上万的群众，1968年军人政权搞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69年在武汉镇压所谓的516集团和“北决杨分子”，以及1976年底以来的“揭、批、查”运动的责任追究。因为所有这些运动都造成成千上百人被斗被关、致伤致残。仅仅因为不是湖北的造反派搞的，都不予任何法律追究。胡厚民在法庭上最后说：“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无论从今天法律公正的角度，还是当年中国已经制定了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来看，胡厚民的辩护都非但是合法的，而且是合理的。尽管胡在湖北造反派领袖中只是第四、第五号人物，但是结果却以他“认罪态度恶劣”而重判了二十年徒刑，最后惨死在狱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领导和主持整个审判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韩宁夫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北省委大抓牛鬼蛇神

的第一线领导，又是在一月夺权中被胡厚民等造反派的批斗对象，此案的个人恩恩怨怨，便尽在不言之中了……

如果说1982年对造反派领袖的审判还只是针对百余名著名人物，而且经过了一定的——虽然很不像样的——法庭程序，那么中共在1983—1989年间发动的“清查三种人”的运动，就把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国。本来中国八十年代初的政治局面已一派大有希望的改革景象。但是邓小平为代表中共老官僚集团先是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后又自由地联想到文革中的造反派会“从当年搞极‘左’跳到另一个极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劲得很。对这些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们就会爬上来。等到将来土壤、气候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会兴风作浪，乘机上台。所以对这些人的能量，对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危险性、危害性，千万不能低估。”（《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1983年11月16日）为此，中共中央在1982年12月30日和1984年7月31日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什么是“三种人”呢？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一开始，这一运动还只是中共党内整党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波及全国全民的政治运动。对全国高校参加过造反的学生，中共还特别“青睐”，于1983年4月23日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换句话说，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隐性的“黑五类”，起码丧失了“被选拔”和“出国”两项重要的公民权。

如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在一个国家已经有了正式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一个党以它自己党规党法不通过任何国家法律程序，而只是政治运动来刑罚成千上万非党群众，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从中共文件定义的“三种人”来看，除了“打砸抢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实实在在的刑事责任外，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严重”都没有触犯刑律：前者不符合起码的历史常识；后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对“打砸抢分子”的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这里也有一个追诉的法律“时效性”的界限。

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种人”的运动还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抢分子”，那么无论他们在文革中属于哪一个派别，无论他们的现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王子犯法何庶民同罪”。而实际上，中共老官僚集团发动的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在1966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共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大意）。由此，这批高干子弟便一直被包庇了下来。即便在发动这场运动的讲话里，邓小平也公开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做得行吗？不能把那时在特殊情况下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的，也说成是‘三种人’。”（《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同上）——换句话说：即便中共的老干部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迫害无辜，指挥逼供信，操纵武斗，打人致伤致残，都没有关系，只要用轻轻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的截然不同的两套标准来清查“打砸抢”，会有公

正的结果吗？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二十万群众。既有反对他的造反派“四二二”，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因为韦国清和邓小平私交甚笃，非但被包庇下来，还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另一个例子。滕海清是一手制造“内人党”罪魁祸首之一。仅据中共自己的文件承认：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这一臭名昭着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中共打死16,222人，致残87,188人。但因为滕海清是在军内很有人脉的“老干部”，晚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相反，内蒙古师院学生造反派东方红纵队的头头之一的高树华，在当时仅是内蒙古革委会常委，更曾经对这一冤案公开提出过异议。但却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四年，作为滕海清等老干部罪行的替罪羊。结果在查了四年都无法查出他任何“打砸抢”问题的情况下，才于1983年7月5日被迫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释放。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清查”标准，这场运动有什么法律公正可言？

如上所述，造反派问题无论在文革研究中还是在中国的社会的现实里，都成了一个函待澄清的历史真相和急需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在这一时候，周伦佐先生的《“文革”造反派真相》写成出版，不仅对于文革研究的学科建设有很大的建设性，对于官方的文革“结论”一如中共的《决议》——自然也具有了极大的挑战性。

~~~~~

## 【上访申诉】

### 云南“揭批查”中的大冤案

• 周金昌 •

揭、批、查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最后一个政治运动，也是云南唯一没有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的运动，既得利益集团，像保护贾宝玉脖子上的玉一样呵护着它，像阿Q头上的疮疤——揭不得、动不得。

一九七六年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云南省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安平生，为了掩盖他们与林彪、“四人帮”的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见徐忠启《往事回顾》），下了一个毒招，借手中的权力，再次挑起派性的狂潮，他们违背中央清查中的一系列指示和清查标准，无端罗织罪名，把一派群众打下去，把数万人搞去劳改、劳教，因而形成了陈年累月的一大批上访群体，老上访户。

大自然从春到冬已经走完了28个寒暑，岁月和苦难的煎熬这些受害者头上已飞满了白雪，多数人重病缠身，无钱医治，熬不过苦难的已先后含恨离开了人世，在弥留之际还喋喋不休告诉儿孙和难友，一定要为清白和无辜申诉，再申诉。

为此，28年来我们也不知道向各级司法、党、政部门写过多少申诉书，每个人都有存稿一摞又一摞。为此，我们的脚板也不知北京、昆明跑了多少遍，苦苦的述求呀，彷徨中的等待，迎来的都是互相间的推诿与白眼。为此，公安机关为了“守土有责”也不知花了多少警力与纳税人的钱财，来防止“刁民”在苦难中的申诉——上访。他们要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那管小民的苦和难。

令人关注的十六大召开了，中央产生了新的领导人，几年来的亲民政策，迎来了人民的尊

敬，再次唤起了我们这些尚未灭泯的心灵。特别是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召开，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决策。我们奔走相告，认为这是一部解决目前各类社会矛盾的好经，但愿云南的歪嘴和尚，这次不要再念错，和中央一起同唱一首和谐的歌声。

一、唱好这首和谐的歌，首先就要还“清查”的帐。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随之而来的揭、批、查运动，中央就有明确指示，清查“四人帮”的对象只能是与他们有直接联系的人；清查范围仅限于省军级；打击面只能是“四人帮”的心腹干将，不能任意扩大。然而云南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安平生，对中央这些指示予不顾。一下子就把矛头指向云南的另一派群众组织。1976年12月8日在全省揭批查动员大会上宣布：“查清、粉碎了以省委那几个把持军政大权的人为后台，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帮派体系的清查对象”为标准。从此，上挂下连，凡参加这个群众组织的人，都成了说清问题的对象，成了“四人帮”的须根，号召另一派的人要象打日本鬼子、斗地主老财一样去报复另一派，哪怕是普通工人、农民、老红军、老干部。边陲的天空一时间杀气腾腾，阴风熠熠，一片白色恐怖。他们支持的那派，则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充当安平生等人的“派卫军”，把已经冷确了下来的派性斗争，又疯狂地燃烧了起来，以百倍的疯狂，向他们的对手扑去，誓报“划线站队”时已纠正了错误的仇恨。栽赃陷害，捕风捉影之风骤起，创造了云南有史以来数万件冤、假、错案。只要这些“派卫军”有人说××划线时打过人，就马上成为打砸抢分子；出身不好的成了“阶级报复”分子。正如云南省高院原副院长李文进在二监派性狂言中讲的“路线正确，一切都对，路线错了一切都是错误的”。“老子连盖章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审你们，单位报上来的材料，党委做个决定，就可以判你们刑了。”他们那一派哪怕是杀人犯、放火犯都一律平反昭雪，如思茅地区墨江农民进城杀了500多人的6.28事件，普洱农民进城杀了80多人的8.1火案，澜沧农民进城杀了38人的7.26事件都一律平反，有的杀人犯还委以重任。权利加派性的疯狂，形成了一派专另一派政的历史悲剧。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受批判斗争的就 有150万人（约为文革中参加这个群众组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15万人，抓捕判刑和劳教的约五万余人。县团以上干部为7549人。

例一，思茅地区景东县为例，全县被批斗人数为3100多人，被打伤致残的1000多人。从县到生产队撤换干部1000多人，抓捕125人，由公安、警察、专案组 将受审人员五花大绑押到14个公社巡回游斗108人，正式判刑53人，在批斗大会上活活打死4人，残酷折磨致死9人。

例二，思茅是行署所在地，文革中只不过是普洱县辖区的一个镇，人口不足二万。当时一口气就抓了103人，判刑52人，逼死8人。

例三，普洱县小学教师罗廷祖，被普洱县常委会用55个字，以反革命罪判了6年刑，出狱后，不给落户，成了没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

白恩培书记，你在《云南现代简历》的序言中声称，“云南不存在冤、假、错案”，“全省只判了24个人”，在事实面前不觉得脸红和面愧吗？是你受蒙蔽，还是有人借你的地位来掩护他们的罪行，我们不得而知。

问题的实质还在于，云南清查“四人帮”乞今为止，派了数万干部，折腾了28年，在你们认为这个“体系”中一个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也没查出来。鲁瑞林将军是你们认定的黑后台，还捏造了一个一.二四假案陷害他，可中央认为是假案，为他平了反。朱克家你们认定的是这个“体系”的首席代表，目前重新入了党，在恩洪煤矿任部门经理。“体系”中两个主要

人都成了好人，那么“体系”主体都不存在了，为什么现在还在那里“体系”长“体系”短的嚷嚷。不外乎一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二是为了继续利用权力欺骗不明真象的群众。

众所周知文革中“天下大乱”每个省、每个单位、每个县，甚至有的家庭都分成两派。如果全国所有省、地、县都像你们的搞法，岂不是全国有一半人口变成了“体系”，天下不乱才怪呢。

28年来我们一次次上访，你们一次次封杀。今年3月29日，部份受害者找省委、在接见代表们时，还首先来了个杀威棒，“你们案子不要讲，两案不能翻，翻案是不行的。”

4月25日，信访局长为首，有组织部、政法委、省纪委参加的接见我们的五个代表的会议上，我们要求“案子不能翻”我们有知情权，法律是公开的，几个在场的领导没有人能出示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来。没有任何人敢于正面回答我等提出的问题。

两案者，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也。这两个案件，早在20多年前，中央特别法庭已经审理终结，他们的判决书想来你们已经读过。庭审期间没有任何涉及云南的人和事、判决书也没有任何地方涉及云南有人与他们有关联。那么，我们这些受害者，任何人与他们都挂不起钩来，毫无干系。你们现在为什么还在讲“两案不能翻”，我们有谁是在为他们翻案？你们硬要把我等打成两案，其用心不外乎为了政治需要混淆视听，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用大帽子压制受害者。准确的说我们是云南省王必成、安平生等人趁粉碎“四人帮”之机，制造出来的大冤案、大血案，是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的大错案。对于这个大错案，中央早就下了改正令，只不过你们仗着云南山高皇帝远，加上欺下瞒上，又有权力指令公安保驾护航，不准上访，才拖到今天。

早在1982年，中央两案工作会议期间，胡耀帮总书记就讲：“清查工作必须按中央标准来进行清查，不能另立标准，另搞一套，把不该清查的人列入清查对象，把一派群众组织，作为‘四人帮’帮派体系，把一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活动，当作‘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来对待，就是扩大化，搞错了就要平反，就要纠正。”

1984年邓小平在接见安平生、李启明时也说：文革中两派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帮派体系，这个必须纠正，早纠正比晚纠正好，自己纠正，比别人纠正好。

1997年12月12日，罗干在全国信访局长会议上讲：“阳市清查运动扩大化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中央多次申明，地、县两级不存在‘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要尽快落实解决。”

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接待处领导同志在接见西双版纳上访的人时，诙谐的讲：“都说西双版纳美丽，可是，那里有这么多‘四人帮’谁还敢去？中央从未发过文件叫下面抓‘四人帮’是你们西双版纳州委自己搞的……”

我们不明白，云南的高官们，为什么至今还在与中央唱反调。2001年11号文件还要把我们打成“没有改造好的帮派分子”中央叫纠正、平反，最近还在顶着“翻案是不行的”这一切都说明你们还在对抗中央，扩大矛盾，压制受害者，能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吗？公平与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法律和政策在受害人这一边。可以断言，坚持错误，不但受损失是受害人，而是党心、民心。我们这些人是死了心的，清白人生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一定要抗争到底。

二、“我们也想纠正，但是上面没有政策”。

讲这些话的人，大多是一些有良知的法官。

其实关于纠正“揭、批、查”中的错误，不是什么没有政策的问题，说到底云南当政者愿不愿意从“左”的路线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问题，愿不愿意克服派性增强党性的问题，难道中央为解决这个问题发的文件还少吗？从文件汇编中我们查出的有中发（77）4号文件（78）48号文件，中纪二办秘字（80）25号文件，中发（82）9号文件（这是解决两案的纲领性文件）中办法，（83）9号文件，中办法（86）6号文件，这些文件，当权者不是闻过饰非，就是走走过场。（82）9号文件当受害者从外省贯彻传到云南省后，他们为了压制中央政策在云南贯彻执行，还以泄密罪抓了近千人，关押了两年多，其用心是何等歹毒。思茅地区中院，根据这些政策，据我们所知，就曾进行过认真清理，并着手解决，在判刑的52人中，先后纠正了14人，某负责人告知某受害者，他看过500多份案件，一个够判刑案件的都没有。98年他们说准备解决几个有影响的人，县上的问题就好办了。

这14个人解决，难道中院不是依法改判的吗？是由于没有政策才改判的吗？

目前所谓没有政策，就是某大人物以言代法，在99年左右下了冻结令，用“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来反对党的有错必纠的原则，事过四、五年了，还在讲“案子不要谈”“翻案是不行的。”省高院××讲我们已向省委写了报告，人家不答复怎么办呢？思茅中院×负责人讲：“如果上面有指示，我们不睡觉也会给你们办的”。“我们每次到省里开会，都提过这个问题，都说省委没有文件”。玉溪市委、景洪市委都曾写过专题报告，可见各级党委和政法部门都承认这个错案的既成事实，只是省委闭着眼睛说瞎话“没有冤、假案”。近日更加蛮横武断“案子不要谈，不纠正了。”这是你们在诚心构建和谐社会吗？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

“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到底是什么人的口谕，能具有这么大的能量？一，法律是公开的，是公共行为的准则，我们有知情权，我们强烈要求光明正大告诉老百姓；二，法律的实施与废止、解释，是人大的权力，这位“三不指示”的人有什么权力剥夺人大的权力。三，有错必纠，依法行政，清查中老一辈革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他有什么权力篡改。是全党服从中央、还是全党服从个人。

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和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为了自身的清白，为了生存，为了建立依法治国的和谐社会，我们誓将抗争到底。纵观历史，大凡贤明的君主，其伟大之处，必然是知错必改。共产党就是从不断改正错误中走过来而前进的。要知道正视错误并解决错误才是有信心、有力量、有良知的表现啊！

三、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28年的苦难，我们这些老上访，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有广大的工人、农民、法官、老红军、老干部，他们早就对此事有过公平的定论，对省委某些人枉法弄权倒行逆施行为早已深恶痛绝，本《信》将其要者录后。

90年代原云南省委副书记马继孔写了一本《紫苑随笔》有这样一段话：“组织了几万干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一个真帮派体系也查不到，查了15年却伤害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执行的是”党内分裂向后看“。”他们对上不听招呼，听了传达拒不执行，对下，对伤害的同志，又封锁消息，也不平反，直至今日。”



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将军在《西南三十年》中写道：“云南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根深蒂固，热衷于搞派性的人，在口头上并不承认自己有派性，但在具体问题上就表现出来了……就必然在揭批查中发挥其破坏性和影响作用……”

景洪县小勐养农场×××党委书记，在解决揭、批、查蒙冤坐牢释放回来安置就业的人员会上讲：过去我有派性，抓你们时巴不得枪毙，才解心头之恨，现在看来错了，司法上的事，我无权解决，现在回来了，同等工龄，别人拿多少，给你们拿多少。

思茅地区主管政法的×××副书记，1998年当听完受害人×××陈述当时揭、批、查时阴风熠熠、杀气腾腾的状况后，感叹道，这真是“山高皇帝远啊。”“神仙打架百姓遭殃。”“不几天他就为这个受害者签发了改判文书。

×××民警，她负责监控×××受害者，2004年8月15日为这个受害者送去了水果、月饼，见面后讲道：×大爷，我也知道你是受冤枉的，人家上面叫我来看着你，请你理解，出了什么事，我们的饭碗也会丢的啊！

思茅地区原组织部副部长，当时运动办公室负责人×××，一天与受害人×××不期而遇，他深切地握着手说：这些年你受苦啦，那时人家李德云（组织部长）想抓谁，就抓谁，哪个还敢说个“不”字，就连张文英（地委书记）也讲，老史啊全区凡公社以上一派观点的已经抓了2000多人了，这样搞下去，以后怎么交待！

这样的深切同情太多太多了，本《信》无法全写下来。

近来，科学发达，从《毛泽东旗帜网站》我们也获知许多老红军、老八路，也通过网上为我等鸣不平，如33年参加红军91岁高龄的郑加平老人，33年参加红军90岁高龄的黄泥太老人；33年参加红军89岁的王忠远老人；37年参加八路军83岁的王奇老人，35年参加革命，原昆明市委副书记李书成老人……

由于28年来，我们有冤无处申，有状无处告，委省一些领导又固执己见，不愿改正错误，上访北京他们又监控又打压不能成行。怎么办？我们相信共产党还是好人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无门喊冤，才写了个贴子，希望网友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我们讲讲公道话，催催省委，改正错误，为构建和谐的云南做点好事，我等将永远难忘。

思茅市部分受害人叩拜

林进良 郭继忠 李文兴 郭喜群 杨春正 高 岩 吴培信 李红兵 杨中湘 白荣华 金家柱 罗廷祖 刘仕昌 李红武 邱燮荣 王保昌

2005年5月20日

~~~~~

【亡灵祭坛】

卞仲耘纪念会在京举办

• 佚名 •

今年8月5日，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先生遇难40周年纪念日，

她是北京地区第一个死于文革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先生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及子女，近日约请部分卞老师生前同事、学生、朋友及关注这一事件的有关人士，聚会纪念卞仲耘老师遇难四十周年暨诞辰九十周年。

聚会者向卞老师遗像默哀以致怀念。随后，播放了由独立制片人胡杰摄制的专题片《我虽死去》，该片通过采访王晶尧先生等人，叙述了卞仲耘老师的遇难经过。聚会者在发言中回顾卞老师生前事迹，怀念这位真诚、勤恳、与人为善的教育工作者，反思文革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暴力行为。

聚会者痛感，文革发生已四十年，光阴荏苒，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人到中年，当年刚刚涉世的中学生如今也年过半百，不仅年轻人不知道卞仲耘其人，很多经历了文革苦难的人也说不清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有人甚至认为，文革是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历史，常常显得那么势利，那么健忘，那么没有心肝。当年，那些花季少女、莘莘学子，为什么会起而伤害她们的师长？究竟谁是杀害卞仲耘的真凶？这是我们几代人都有责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与会者认为，文革是打着所谓革命的旗号把专制极权主义表现到极致。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中国最大的包袱就是专制主义的传统。卞仲耘老师就是在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打着革命旗号的专制主义的体制下惨遭杀害的。必须坚决地铲除这个专制极权主义。

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Y女士说，我这些年采访了很多同学，大家其实并没有忘记卞校长。今天，我代表我们这些同学向卞校长、向卞校长的家庭，表示深深的道歉！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地有罪！我们作为这个学校的学生，都有罪！这些年，我和同学们在谈论这件事时，都在反思，为什么在这样一所当年全国最好的女校，会发生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从影片中看，这个学校的学生语言非常粗鲁，你不能想象这些学生当年受着中国最好的教育。

影片中《在太行山上》歌声一起，我就开始流泪：我们的中国革命道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是我和同学们多年来思考的问题。我父母也象卞校长、王先生一样，都是三八式干部，他们是革命的一代，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怎么会以革命的名义杀戮卞校长这样追求革命的人？我们的同学中，有人不愿意谈论卞校长，有人在有意遮掩，但怀念她的，也大有人在。

卞仲耘的一个女儿在会上用有些颤抖的声音，深切怀念她亲爱的妈妈。她对母亲罹难四十年之际，朋友们举办这样一个纪念会，表示深深的谢意；也对胡杰先生秉承良知和正义感，拍摄这部纪念电影（尚为未定稿），表示感谢。她为与会者，其中多为八、九十岁的前辈，能够参加这次纪念会，鞠躬致意！

会上，还宣读了北京原师大女附中学生、文革研究者、最早将卞仲耘之死公之于众的王友琴女士的来信。她在信中说：

知道要给卞仲耘校长开纪念会的消息，我在万里之外的芝加哥也感到激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同时被打伤的还有四名学校领导，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当时，我在学生群中看着这场暴行发生。然而，直到1986年，我才写了一篇文章来记述和控诉卞校长之死。

1993年8月，我第一次去王晶尧先生的家访问。王晶尧先生说，27年来，我是唯一的为纪念卞校长之死访问他的学生。那一天，王晶尧先生还告诉我说：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里，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卞校长和他们夫妇青年时代就开始的两位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

王先生的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表现了那个时期的恐怖。在1966年5月16日，发动文革的‘516通知’明确规定了把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新闻界作为打击对象。在7月底，文革领导人又公然鼓动学生使用暴力，就这样，卞校长和他们夫妇在文化界的朋友，还有更多的人的生命，被文革的铁轮永远碾碎了。这种迫害的广度、密度和残忍程度，后人会难以想象。

在北京，卞校长是第一个文革暴力的受难者。她的死亡是如此悲惨，但是她的惨剧却远远不是一个人的不幸。据我的调查，在女三中，在男八中，在师大二附中，在女四中，在女十中，在女十五中，在宽街小学，不但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校长或者老师，被殴打折磨致死。事实上，全中国所有的学校校长，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暴力性的‘斗争’，无一例外。在北京，1966年8月有数千人被打死。

王先生的这句话给我深刻印象，也因为让我一再思考，除了最宝贵的亲人、朋友的生命，文革还使我们失去了什么？

文明的堕落显然是重要的一项。在校园里，由学生把校长活活打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野蛮行径。而且，卞校长是被一群女红卫兵打死的。我强调‘女红卫兵’，是想说明她们的暴力行为不能归为一般男孩子可能较易有的暴力倾向，女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完全是文革鼓动激发起来的。正是因为这样，杀害卞校长成为文革犯罪和暴行的代表性标志。

道德的堕落也是重要的一项。卞校长被害已经40年，从来没有参与暴行的红卫兵对他的家人表示道歉，哪怕只说简单的三个字‘对不起’。多年来，还不断有人说，卞校长是因为‘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实际上就是否认卞校长死于暴力迫害。这样说谎，良心何在！

我深深感谢你们召开这一纪念会。你们纪念一位师长，一位母亲，一位好人，同时，也是在纪念一名文革受难者。就最后一项意义而言，你们也是在纪念千千万万的文化大革命受难者。你们开这个纪念会，因为你们尊重生命，肯定正义。当你们纪念卞校长，你们也是在维护我们生活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底线。你们的纪念会意义深远。”

会后，王晶尧先生偕子女前往八宝山祭奠卞仲耘先生。

~~~~~

## 【春秋史笔】

刘源和父亲刘少奇

• 金 钟 •

承友人赠送新书《刘少奇与新中国》，刘源著，并附DVD五张碟。这本书是同名电视片的文字说明（解说词）。作者说，该电视片二〇〇二年制作完成，这本书则经过多次修改而由香港大风出版社于去年出版，今年再版，公开发行。

四十年前的文革，是以打倒刘少奇为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刘是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发动文革定刘为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一九六七年开始挨斗、禁闭，终于一九六九年秘密死于河南开封。刘少奇的子女好几个，命运各异，惟小儿子刘源成为今日的红色接班人。一九五一年出生的刘源，在文革中有过被拘押、

下放农村、劳改、入狱、当工人的遭遇。文革后，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在河南从政，自县长、郑州市副市长至副省长。一九九二年转入武警部队，一九九八年任武警副政委，二〇〇〇年授中将军衔，二〇〇三年任总后勤部副政委，二〇〇五年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已是主导中共军事研究的高级将领。

因此，从刘少奇到刘源，便构成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传奇，而蕴含着值得探索的迷藏。令我最好奇者，莫过于毛刘矛盾真相和刘源怎样继承父辈的“遗产”？这部电视片由刘少奇的爱子和爱妻主打，现身作证，应该有其特殊的史料价值。

#### ◇ 描述刘少奇夫妇六一年回乡经历

花了点工夫，看完五张DVD。这套政论片全面地为刘少奇在政治上恢复名誉。首先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入手，指出刘是最忠实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成熟后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方针，从提出“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到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证明刘的“社会主义准备阶段”要二、三十年时间的主张，和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吻合，是符合马列经典的。继而谈到刘少奇在主持制定一九五四年宪法和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的贡献，奠定法制基础，主张阶级合作，以人民内部矛盾代替阶级斗争。

有了这样的铺垫，毛刘的分歧便逐渐展开，导致大跃进 / 大饥荒后的分道扬镳。值得肯定的是，刘源没有回避刘少奇追随毛泽东的事实，他指出大跃进初期，刘也头脑发热，说超过英国二、三年就行了，赶上美国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够了。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仗义执言的彭德怀时，他也附合毛，主持批斗会。但是，事实教训了刘，这是他和毛的不同之处。也是刘源书中最有价值的部份。

刘源详细描述一九六一年四月，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回故乡湖南作长达四十四天的调查经过。利用了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和访问幸存的当事人。经过大饥荒洗劫的故乡，令这位共产党领袖动了恻隐之心，他下榻养猪场的弃房。与数百人个别谈话，开了几十场座谈会，他看到包括亲戚在内的乡亲们的悲惨，“无奈地看着姐姐一家，几乎没有说话。”他向乡民们道歉，甚至要他们将这次的教训“刻成碑、记上账、传给子孙，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一位七十岁老农的话，令他刻骨铭心：“哪里是天灾，是闹人祸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下边尽胡闹，并村拆屋，一切归公，把家底弃光了。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这是王光美在影片中亲口转述的。

可以对照的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回家乡韶山。那时，饥荒已经蔓延，彭德怀也回湖南作过调查。毛的韶山行，有祭祖坟、畅游水库，和少先队员合影等节目，写了一首七律，豪情万丈，“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没有丝毫万民已陷绝境的感觉。当然不是不知情。毛从韶山上庐山，毫不留情地将忧民如焚的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

#### ◇ 刘少奇七千人大会中毛的“阳谋”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被史家们认为是毛刘分歧的公开化。刘源在影片中作了进一步披露。根据史载：七千人大会的报告是中央委托刘起草的，可是在会前一天，毛提出，报告已印发，就不必念了，要刘在会上另作发言放开讲一讲”。刘立即退席，表示要作准备。查阅《刘少奇选集》，可以看到关于七千人大会刘的报告及讲话各一篇。报告近五万字，讲话一万七千字。仔细研读，发现二者大有玄妙。报告是一篇标准的党八股，按照正统格式，形势任务，成绩缺点，条分缕析。维护党和领袖的声誉，引用毛语录达六十次之多。所谓教训、不足之处，

用词皆极谨慎。显然，有庐山会议的前车之鉴，刘不敢冒犯毛。

然而，那篇遵毛之嘱，“放开讲”的讲话，却逆了“龙鳞”（李志绥语），只引毛语三次。刘讲话中，有两处，毛一定十分恼怒。一是他引老农的话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二是，否定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毛当作口头禅的公式），说错误可能比三个指头还多。——这两说，直接冲击了毛倡导的、沿用至今的金科玉律。影片有纪录七千人大会的画面。我们清楚看到毛在刘讲话时，用手指沾口水翻阅文件，脸色很难看。

然后是毛的讲话。此文可以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查到，毛虽然也空空地说了两句自我批评的话，也讲了些要民主、实事求是的大话，但更重要的是在维护“三面红旗”，说反对“三面红旗”的是外国帝修反。要下面各级都检查，并警告不准组织秘密集团。语气严厉，居高临下。在毛讲话之前，林彪作了一个肉麻地吹捧毛的即席发言，把大跃进的灾难形容成必须的“付学费”，说毛主席总是对的——和大会的反省气氛背道而驰。但毛竟然当场对林的讲话予以肯定，还要发至全国。

可见，刘少奇讲实话是中了毛的“阳谋”，虽然，在大会大多数的压力下，毛不敢像收拾彭德怀那样即时搞掉刘，他还要借刘之力收拾大灾难造成的残局，但这笔账他是记下了。文革中，六七年二月毛对阿尔巴尼亚巴卢库吐露了真情，他说七千人大会已看出苗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然而，数千万人死于“三面红旗”之下，这是毛内心去不了的结子。因此，最后打倒刘少奇也好用“叛徒、内奸、工贼”之名义，不用路线分歧作罪名。

#### ◇ 刘源主张防左反右的中庸之道

刘少奇平反已经二十多年，今天怎样看毛刘的分歧？刘源有一个回答。他在“作者的话”中概括地谈到毛刘的区别：

他说，毛追求的是农业社会主义，“政治斗争不择手段。从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出发，搞到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无论如何不能说服人。”刘少奇则是“实事求是，更多来自一线工作的具体实践、经济要运转、人民要吃饭。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无法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在最后一章，更肯定“刘少奇奠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前副总理谷牧还说：“今天所讲的所做的许多事情，是从他（刘少奇）那里开始的！”刘源特地把王小强一九七九年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文章作为后记收入书内，以凸显刘与毛的分歧。

但刘源没有把毛刘分歧对抗化。他说，“从刘少奇发动和领导的四清运动，从一次又一次真诚检讨‘右’，一次又一次真诚地希望跟上毛泽东”，可以看到刘不是向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投降，仍然是“卷旗不缴枪”的坚定政治信仰。他说这样才能理解为甚么刘“从来不反对毛泽东”，为甚么党内对毛的家长作风一再迁就、姑息直到酿成文革。

“卷旗不缴枪”之说，刘源称乃王小强“对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解”。他认为毛从反右到文革，继续革命，最后还是要“起用邓小平、欢迎尼克松”；而刘少奇搞了“三自一包”，“经济刚刚恢复，马上发动四清运动。”他说，毛“出于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才得出判断，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根子在党内走资派，必须发动群众造反。”

总之，刘源认为毛刘都有“绝不投降的坚定信仰”，因此，他赞赏邓小平“两手都要硬”的策略。他认为“东欧易帜，苏联解体后，共产党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不抓强国，单讲富民，注定走不了多远。”中国面对全球化，“组建大企业集团，振兴军工和战略产业，是生死存

亡的紧迫任务。”是“卷旗不缴枪的标志性体现。”

刘源提出一个“左右适度的中庸之道”的理想模式，左右开弓，既防“左”又反“右”，为的是防止左如文革，右如苏东解体的“大灾难”！

#### ◇ 毛刘对大饥荒态度的分歧

可以相信，这种构思，有相当的代表性，由刘源这样坦白而通俗地表达出来，也很难得。但仍掩饰不了当局者迷的局限与贫乏。

首先，他把这种构思的来源，建立在毛刘治国的等量齐观的评价上，已违背历史真实。他指出刘少奇也有左的一面，不断紧跟毛的一面。诚然不错。犹记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的中共高层人物在批斗彭德怀时的表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陶铸等“正派”角色，丑态毕露，令人吃惊。（尤以刘宣称他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那段话令李锐感慨万分）。这显示，中共早已不是甚么奉行民主集中制、为真理而奋斗的政党，而是一个高度封建性质的专制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说毛刘是一丘之貉未尝不可。但是，历史是可以具体分析的，历史人物的功过也是可以具体考证的。不必援引史家们大量的资料，仅以刘源此书所指刘少奇两大左倾为例，一是附合大跃进超英赶美之说词，二是四清运动。

前者可以归于“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类（虽然，非洲落后国家的执政党也不会如此胡搞乱来）。姑且，也可以谅解始作俑者毛的狂热。但是当大跃进引致大饥荒、饿殍遍野时，还在维护错误的决策，甚至把党内高干的反省进言，打为反党，进而置于死地，这就是不可原谅的罪行。毛就是这样的罪人。刘却不是。刘源的这部影片是证明。当刘发现大跃进政策确实错了，他有痛苦的反省，而且有七千人大会的公开检讨。而毛至死，对“三面红旗”不仅不认错，而且以此为划定革命与反革命的根据之一，不知造成多少家破人亡。

#### ◇ 四清运动并非刘少奇之罪

说到“四清”。有人说是文革预演，有人说是矛头对下不对上。刘源也承认，那时搞干部的“多吃多占”，比之今天的贪污腐败，恐怕是“小巫见大魔”。刘少奇夫妇搞四清，何以那样煞有介事，义愤填膺？我以为是值得推敲的。他要“跟上毛泽东”——这应是合理的推测。据高华教授的研究，四清运动源起于毛对大饥荒原因的解釋——阶级斗争。信阳饿死一百万人，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下去调查，回到北京只敢在妻子面前痛哭，不敢直报中央。毛对信阳事件的批示是：出乱子（死人）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全国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上，要开展阶级斗争夺权。从一九六〇年起，毛对农村的饥荒一直以“坏人破坏”作盾牌，六二年九月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六三年的“前十条”号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正式提出“四清”，要求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怎么能说“四清”是刘少奇发动的呢？

在毛已经和林彪结盟，准备推行军事独裁专政的大趋势下，高层已纷纷从大跃进失败的让步政策中转向，周恩来最滑头，在饥荒最严重时，代中央下文称饥荒原因是“封建势力篡夺领导权实行绝望的破坏性的报复”。刘却直到六四年十二月还坚持把四清的阶级斗争限制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内，因而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在政治局会上，毛拿宪法党章和刘闹场。因此，在六五年“四清”后期刘才加大左倾力度，这诚然为了自保，却明显因毛的压力所致。

一九九八年，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刘源曾有文章披露毛刘分歧真相，包括刘见毛，力陈“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样重要的事实。

为甚么七年之后，刘源制作电视片又出书，对刘少奇的评述，竟倒退到和一个流氓皇帝平分秋色的地步？一部中国当代史还有何公平可言？刘对捧毛上神台诚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自古到今，中国人不是崇尚大节、晚节吗？刘从大跃进失败，千百万人因中共政策而饿毙的血的教训中醒悟，摆脱极左教条，救民于水火之中，而终为独夫所害。这是大节，也是晚节。他从六一年到六九年，这最后的八年是值得国人和史家怀念的。他的功绩不在赵紫阳六四反对镇压之下。

◇ 杀父之仇：过时的观念？

最后，我想到一个传统观念，似乎可以一议。中国的章回小说常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描写，不知道现代伦理学家们作何评论，但确实知道共产党是很在乎这一条的，至少以前他们规定：父被镇压者，不得入党入团。中共鼓励“大义灭亲”也尽人皆知，在毛时代可能每个家庭都有这类故事，至少划清界限，那是在所难免。亲人反目，同室操戈的血与泪，记忆犹新。今天，人们厌恶、痛心那段历史，是人性的复归。

刘源在刘少奇纪念碑揭幕上，打着伞流泪的镜头，一家人在海上抛撒刘少奇骨灰时的悲恸场面，都令人印象深刻，感到这些王族的遗属们，也有一份常人的感情，而不是像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的铁石心肠，他们看着妻子被关押，兄弟被处决，而在斯大林面前不动声色。

刘源和他母亲王光美毕竟知道许多高层内幕，他在书中写道：“一九六六年初，父亲大病初愈，对我们讲了很多话。其中两次提到，『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我一直在猜度他那时的心境。”（第二〇一页）那时刘源十五岁，未必成熟，可其父是对家人讲话，这些“很多话”是甚么？有没有记下来？“让刘少奇的那些真知卓见，从尘封的档案中走出来。”没有。刘的心境为何，也没有交待。“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这句话却成为这本书的包装句子。

令人费解。六六年初，毛林已经磨刀霍霍开始下手了。罗瑞卿已两次跳楼自杀。刘少奇还不知道国运日危风暴将临吗？哪里还有他十年机会？从刘源这本书（这套电视片）实在看不出对国之大恶的独裁者有一点“嫉恶如仇”的影子，即使按中共规格评论历史，也“放水”太多。读读邓小平一九八〇年论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吧，至少可以大大方方批点一下“权力的高度集中”吧。没有。究竟是迂迴战术呢？还是外人的要求过高？

“太子党”是人们多年的话题。五十五岁的刘源是正宗的前太子爷。他可能没有许多太子党那样跋扈与贪婪，他也没有理由成为一个“修养”到家的驯服工具。刘少奇的惨死，实在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奇冤，其涵义，远超越一个家庭的悲剧，那是一位“共和国”的元首被蓄意谋杀-----刘源理应成为一位当代中国伦理价值的指标性人物。然而，在成千上万被毛整得九死一生的中共干部仍然匍匐在毛已贬值的淫威之下，在物欲横流、道义沦丧的国情中，刘源恐怕也只能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庸指标。

2006 年7月24日

~~~~~

【难忘岁月】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八）

• 刘光耀 •

十六、参加“批、清”运动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篡权的阴谋暴露。毛泽东先拿为林彪打先锋的陈伯达开刀。

1971年春节后，开封师院各路大军班师开封，恰值中共党内“批陈整风”和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批、清”运动。“批”即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清”即清查“5.16”分子。因为“首都红卫兵5.16兵团”搞极左，几乎所有造反派组织都搞极左，陈伯达是支持搞极左的，所以，陈伯达——“5.16”——造反派，自然就联成了一条线。于是，就把陈伯达和“5.16”联系在一起批。清查“5.16”，就是整造反派中的某些头头、骨干及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清查“5.16”的办法是：从批判极左思潮入手，从抓罪行入手。有一种说法：“罪行够就是5.16”。和“清理阶级队伍”一样，都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迫害干部和群众的运动，实际上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反对周恩来大字报的“首都5.16兵团”，而是变成了对人民专政的一种手段。

如果说，1967年2月至7月是河南造反派处于受压的第一次低谷的话，那么，自1971年3月开始的“批、清”运动至1972年底，则是他们受压的第二次低谷。3月份，开封师院六连成立大批判组，我是成员之一。3—4月份，我以“六连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两篇文章：《“有理论”的实质是干扰运动、掩护敌人》和《彻底粉碎“5.16”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还受权以“忠告者”的名义写了一篇《忠言相告，望君深思》。

8—9月份，我还在动力机械厂，连部又让我回校两次，以“六连大批判组”的名义写批判文章。8月写了长文《彻底清算刘少奇一类骗子反对党领导学校、竭力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滔天罪行》。9月写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扫清“批、清”运动中的障碍》。以上5篇文章在全连大会上宣读，并写成大字报张贴。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宣告了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计划的彻底失败后，又妄图武装政变，但仍告失败。林彪等于9月13日乘三叉戟飞机逃跑，然而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批陈整风”立即变为“批林整风”。

在批判林彪之初，开封师院数学系又抓住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9.13”事件期间，师院数学系几位教师正在尉氏农场菜园劳动。农场准备召开批林大会，菜园组推举傅熙如准备作大会发言。11月11日，菜园组举行小组批林会，傅第一个发言，未写发言稿，只有提纲。傅愤怒斥责林彪蠢贼。小组会结束后，小组长立即向农场党支部汇报，说“傅熙如恶毒攻击毛主席为‘毛贼’”。当农场党支部派人质问傅时，傅说，蠢和“毛主席的毛不一样”，把“蠢”字写了一遍，然而却被斥之为“狡辩！”就这样，返校后，数学系办了傅的学习班一个月。直至12月31日才被解脱。

十七、他是“5.16”分子？

河南清查“5.16”在“9.13”之前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开封师院成立了“第三专案办公室”，确定8个重点审查对象，全是造反派头头、骨干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办了其中5个人的专案“学习班”——隔离审查。开封市办重点人学习班50个左右。

1971年10月29日，数学系领导通知我参加“三办”工作。晚上，到“三办”负责

人、军代表、院党委常委廖英办公室报到。廖英，刚提升的副团长，人们称之为“廖三号”。廖英让我到“张乐之学习班”。

张乐之，外语系63级学生。廖英曾在全院大会上两次讲到，开封师院有“确凿证据”的“5.16”分子，就是指张乐之。张乐之也是师院唯一有“确凿证据”的“5.16”分子（据说是省公安厅提供的线索）。和我同时到这个学习班的，还有物理系的许俊良。在我们去之前，学习班成员已有数学系和物理系的两位教师、铁路上的干部高和工人刘，由军代表赵双喜负责。初到学习班，先自学1943年的《审干决定》等文件，再看有关档案材料。可以对张乐之定性的主要（也是唯一）“证据”，是“张乐之发展的5.16分子”李文浩的揭发材料。对于这份材料，我反复看了几遍，琢磨了三天之后，指着材料中的一段对许俊良说：“你再仔细看看这一段，然后咱俩交换认识。”我们两个都认为李文浩的揭发材料有破绽，就约定：在对张攻心发言时，只讲政策、批态度，暂不涉及“5.16”问题。我们参加学习班的最初几次攻心会，廖英都在场，每次会后小结时，廖英都拿我的发言作典型评论，他很赏识。

过了一段，我在攻心策略研究会上说，要注意策略，防止急躁情绪，不吵、不训、不讽刺、不挖苦、不说过头话、不随意上纲。这个发言被有的同志批评为“右倾”。在我连续多次被批评为“右倾”之后，我沉不住气了，机关枪、迫击炮般地回敬十几分钟，对方无语。每每想起这一幕，深感个人修养之欠缺，十分遗憾。

这次摩擦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向主持人老赵提出请求：李文浩的材料是谁去调查的？能否给我和老许介绍一下调查经过？铁路上的老高、老刘就如实地讲了调查过程。我一听，心目中就认为是逼、供、信，遂建议重新调查。经请示廖英，高、刘重新调查。果不出所料，李文浩全盘翻供，而重新讲的倒合乎情理、合乎逻辑。

从此，不再追究张乐之的“5.16”问题，而批判他的“现行反革命”言论。张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夫人斗争”（指江青和王光美之间的斗争）；“毛主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指造反上当）。据此，批判张乐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攻击文化大革命”。

到1973年我才知道，在我和许俊良离开张乐之学习班不久，在十号楼旁挖出一具尸骨，是市内一个工人在十号楼造反派办公室门口被打死的。当时，张乐之在该办公室工作。经审，张乐之讲了实情，承认自己在场而未阻止，自己有责任。审者曾将死者的头骨放在张面前，还要将头骨挂到张乐之的脖子上，吓唬张。

十八、在黄泽生学习班

张乐之学习班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搞头儿，而黄泽生学习班对黄的问题的调查任务，还相当繁重。市革委会主任何俊德（一军七号首长）指示：春节前，黄泽生学习班要有所突破。于是，12月底，我和许俊良被调往黄学习班。

黄泽生，中文系62级学生，八二四头头之一。师院三办提出清查黄的12个问题，何俊德指示查清前6个问题就行了。黄学习班由军代表周瑞云连长负责，加上老许和我共10名成员，专立伙房，一个大师傅做饭。黄泽生住的房间的窗户被钉死，像监狱。黄初来时，曾提出抗议，但无用。

1972年春节后，在这个学习班，发生了三件不愉快的事情。第一件是，当田继善准备出差时，黄泽生要求田为他捎一瓶上海牙膏，因为当时在开封买不到，田继善答应了黄的要求；

结果，田被批评为“右倾”。

第二件是，一个星期日，正吃午饭，黄泽生的夫人和黄的弟弟带着衣物来看黄。老周和另一负责人都回家了，推来推去无人愿去接待，我说，那我就去吧。我先让她们坐下，给倒了开水，然后和蔼地同她们谈话。我按照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和《审干决定》的精神，做家属的工作，以图化阻力为助力，让她们通过书信帮助黄好好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以争取失足者。她们与黄见面的要求我不能答应。到了晚上看电影之前，老周根据某人的汇报，批评我不该如此接待，不该让座、倒水等等。我不服，搬出毛泽东的有关语录和《审干决定》的有关段落，予以争辩。周辩论不过，说：“走，看电影。”我说：“早着哩，我得把话说清楚”。又争了一阵，不了了之。

第三件是，4月份，田继善和我去郑州调查。行前，廖英指示：除了调查黄的有关问题外，了解一下郑州挖“5.16”的形势。在返回汇报时，我讲了以下观点：我们接触到的郑州几个造反派头头，第一承认自己有错误，第二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咱这里，造反派普遍精神受压抑，连跟着造反派走的人，也不敢说话。现在到该提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时候了。还说了一句：郑州没有开封办学习班多。廖英对我这个发言极为不满，当场发火，责问我：“你是说咱学校办学习班多了？”我回敬一句：“我说的是开封市。”

5月至6月，我和历史系张家沧，到外省调查一个多月。回来后，我就提出：何主任指示的搞清楚黄泽生的六个问题，根据本人交代和调查，基本上清楚了，市“三办”给黄定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这一次，无人公开提出异议。到1973年10月才知道，在我这次发言之前，市委已经指示：黄可在校内自由活动；自己到饭厅吃饭；自己住一个屋，不要看管；等等。这些都未向下传达。

十九、“刘光耀同情阶级敌人”

1972年6月，外调返校后，数学系教工党支部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大会讨论，一致通过我的入党申请，党总支批后上报院党委。当时除我之外，被基层党组织通过上报党委的，有化学系教师马志群，中文系教师贾华锋、岳耀钦和外语系教师郑书波。7月，在院党委常委讨论时，这四名均被一致通过，批准为中共党员，而唯独对我产生了分歧。廖英根据我在“三专”的表现，得出结论说：“刘光耀这个同志，忽冷忽热，忽左忽右，阶级立场不稳，同情阶级敌人。”其他常委不了解情况，不好说话。党委书记、军代表胡西照对抓组织工作的常委、军代表高能颜说：“老高，你再去调查一下，今天先不表决。”高到“黄泽生学习班”的党员中调查，他们说：“刘光耀的一些观点都是在内部会议上说的，没有什么错啊！”数学系党总支则强烈要求及时发展。但是，在党委常委又开会讨论时，廖英仍坚持他的意见，就搁置了起来。

7月，开封师院“三专”工作结束。

暑假后，我得知上述情况，分别找了高能颜和常委、院长白钧，他们解释说：“常委不是不批，而是没有批，就是还没有表决。你再等一等。”

秋、冬，我去南阳参加师训班。其间，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被公开批判。我想，我的入党问题可能要受影响。这我不怕，我在写入党申请书时，就已经表明：即使我一辈子组织上入不了党，在信念上也决不动摇，永远经得起组织的考验，达到真正从思想上入党，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伴随我入党问题所引起的一系列认识问题，主要是对“三办”所执行的政策看法问题，我思想上应该弄清楚。我在“三专”的表现、我的那些观点，到底错不错？

错在哪里？今后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该怎么对待怎么处理？我总想弄个明白。于是，1973年春节一过，就去找廖英理论。廖英说不过我，倒拍桌子骂起“黄泽生这小子”来。我说：“廖三号，是咱两个谈话，你骂黄泽生干啥？”谈话不欢而终。

入党问题未解决，我并不后悔。我坚信自己在“三专”没有犯错误。“该说的就说，该做的就做”的做人之道，正是我刘光耀的本性。“不做虚伪政客，不绕矛盾走，不见风驶舵，不揣度上司好恶而为，不为自己往上爬设阶梯”，也是我坚持的做人之道。

值的欣慰的是，张乐之、李文浩未被误定为“5.16”分子，我挽救了两个青年人。可以自豪地说，这是我在“文革”中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李文浩，当时还是个16岁的娃娃；他的父亲李培坤先生（外语系教师）得知上述情况后，见到我，要给我下跪。张乐之返校也向我表示过感谢。

二十、“杀妖风”和“批林批孔”

林彪集团覆灭之后，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而且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但自1972年11月至1973年底，在全国又掀起了批判“右倾回潮”的恶风。毛泽东在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讲到，他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8月5日，毛泽东和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于是，江青一伙在全国掀起了“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运动，提出要批“当代周公”，大肆攻击周恩来。

反“右倾回潮”和“批林批孔”运动，是“文革”中打击、迫害不支持造反派的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的最广泛、最严重的运动。

1973年上半年，我到设在中牟县的开封地区师训班教课，没有参加批河南“右倾回潮”的代表人物王新的活动。下半年教数学系73级一班的课，正是全国范围内开展“评法批儒”时期，开封正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杀曲卢妖风”。曲，即开封军区政委曲光藻；卢，即开封市财委副主任兼蔬菜公司党委书记卢成永。开封市委于8月27日起，召开扩大会议整整一个月，开封师院有三百多人参加。紧接着，开封师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共中央于1972年11月4日颁发的关于公开批判王新的中发〔1972〕42号文件，批林整风，“杀曲、卢妖风”。

开封市的“杀妖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是开封“老保”在1967年“一月风暴”和1968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的第三次低谷，也是“老保”和大批领导干部遭受打击最大、时间最长的时期。

市革委会主任何俊德按照省里某些领导人的版式，在9月27日市委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凡是至今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人，都往曲、卢那边靠。”“文化大革命八年了，如果还不理解、想不通，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曲、卢也是从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展到公开跳出来的。”他还说：“要认真开展批孔。这和批林是一致的。保守的、反动的都是尊孔的，革命的都是反孔的。”在开封师院党委扩大会议的第一天，党委某负责人讲：“会议中心是杀曲、卢妖风”，“重点解决我院的突出问题，如三办内幕，……由对院揭发发展到对系揭发问题，是必然的。”

数学系73级新生入学时，该年级政治辅导员王天城回邢台探亲尚未返校。新任系党总支书记和其他负责人，向新生介绍了王在“文革”中的表现。一天下午，73级学员召开第一次“评法批儒”大会，王天城刚刚落座，一个学生上台，作了点名批判王天城的长篇发言。还有

学员说：“我们不要这样的辅导员！”会后，72级学员对73级学员还不认识辅导员而见面就批的做法表示不满，班长（也是县造反派头头）说：“你们不要王天城，我们要！我们要两个辅导员。”

在院党委扩大会议召开的当天下午，数学系就开始揭批数学系的问题。数学系被点名批判的是陈顺卿，不点名批判的是原总支副书记徐振群。李天增是把自己摆进去在院党委扩大会议上揭批，但在系里也点了他的名。陈顺卿和艺术系的翟克让是由基层组织申报、经市委批准的在党总支扩大会上检查、接受批评帮助的全院重点人物。

我不是党员，不好点名批判。但陈顺卿和徐振群有多少可被批判的材料呢？他们还远没有我的材料多，尤其徐振群，就几乎没有材料。系里贴出了一份不点名专批徐振群的大字报，大部分材料是我的，另有李天增的一些，因为李和我都是“陈、徐线上的人”，是“……逸民”，是“右倾复辟势力的得力干将”。譬如，我在1971年8月写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到处封、抢机要档案，冲击军事机关，挑动大规模武斗，杀害无辜革命群众，破坏社会治安，制造白色恐怖，实行法西斯专政，……，这就是他们搞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他们‘自己领导自己’的结果！”也成了打陈、徐的炮弹。这段话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在批陈、徐的发言中或大字报中只引用而不加以批判呢？从来没有拿出否定的证据以及理论上的批判。涉及我最多的是1972年夏党支部吸收我入党的问题。几乎每一次会议上都据这个问题。有人说：数学系党总支“纳新是纳亲”。“当问陈顺卿×××入党问题时，问‘×××是啥人？’他答：‘是好人。你说啥人？！’”这是教工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陈顺卿的一条主要“罪状”。在总支扩大会议期间，我曾在三天的会议上大字写道：“考验，严峻的考验，更加严峻的考验，定要经得起！”“要光明正大，顾全大局。”“立党为公。”“要出以公心。”“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解剖自己。”“逆耳之言利于行。”“在群众的批评监督中改造自己。在群众斗争的风浪中锻炼成长。”“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痛苦的磨练。虽则痛苦，然成品之光泽耀目可喜”。

在数学系的会议上，我利用全院对“三办”的揭发材料，加上我在两个学习班的感受，作了揭批“三办”的专题发言，题目是《揭批王新罪行及曲卢妖风在我院的影响》。

在这一次院党委扩大会议中，数学系教工党支部、数学系党总支被视为全院问题最严重的重点单位。“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院有名的顽固头头都出在数学系。”可不是嘛，“遵义队”头头李天增、“战斗师”头头林庆兆、“小爬虫”头头刘光耀都在数学系，而且还让刘光耀入党！陈顺卿的办公室成了“裴多斐俱乐部”，一群“老保”在那里无拘无束，自由议论。这也是陈的一条“罪状”。10月11日上午数学系教工分两组讨论，端正态度，准备深入揭发问题，陈顺卿遭到责备。一散会，楼梯刚下一半，陈对反戈一击的某“积极分子”大发雷霆：“×××，你想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陈顺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年”，被扣上“八年一贯制”的帽子。“陈顺卿，你要把数学系教工党支部领向何处去？”“数学系教工党支部是国民党党支部！”——这就是1973年9月至11月中共开封师范学院党委扩大会议期间，在全院批判大会上某些人的结论。

1973年春，听传达批林彪的极右实质后，一位教师在陈顺卿办公室和陈顺卿研究工作时，陈说：“不能再批极左了，再批，把主席革命路线都批了。”这些话在被揭批时，说成“批判林彪的空头政治，就批到主席头上了！再批要批到主席说的一些东西咋办？”后者被认为是攻击毛主席。陈不承认，坚持说的是前者。为这一句话，追、批了陈半个月，不了了之。

在“杀妖风”的基础上，开封市和师院突击发展了一批“造反有功”者加入共产党。

1974年2月至4月，专搞批林批孔。但实际上并没有批林，也没有批孔，而是专批“老保”和领导干部。院党委主要负责人对物理系说：“不要怕说支一派压一派。”刚到任的数学系党总支书记说：“批判数学系的右倾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就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1968年4月，陈顺卿的脖子上和办公室门上曾被挂过“大滑头”的牌子，而实际上照样挨批，并没有滑过去。在“杀妖风”中更未能滑过去。徐振群基本上滑过去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未追究陈，只简单捎带了一下徐，而李天增却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2月22日，数学系学生会在系办公楼墙上，贴出大标语：“李天增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死硬反对派！”下午，数学系在十号楼124教室召开全系教学工作会议，黑板上写了两条标语：“李天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死硬反对派！”“批林批孔——李天增重新做人的最后一次机会”。李天增在当日的大字报中表示：“决心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只要能打垮资本主义的复辟，我就是检查一万次也心甘情愿！”3月6日晚，数学系的团总支、学生会组织召开“联系实际，批林批孔”大会，5个学员发言，都是批判李天增。3月12日晚，系团总支、学生会召开“李天增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议，李天增作检查。检查后，大家评。一位教师发言：“你说满足于‘王新一人负责’，这是为杀妖风斗争翻案！”“文化大革命中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你残酷镇压，第二阶段你积极翻案，第三阶段你反攻倒算，第四阶段你参与妖风。”16日，在全系批林批孔大会上，也主要是批李天增。17日晚，教研室会帮助李天增。22日下午，李天增作第二次检查。会后又评，仍不满意。当晚，李在大会上解释一些问题。4月6日下午，系里召开“联系徐李批林批孔大会”，主席台两侧是一副对联标语：“批林批孔批文礼，斗史斗徐斗天增”。文礼——徐文礼，原一军政委；史——院党委常委、副书记史光；徐——徐振群。“八年一贯制”的帽子，当然要给李天增戴上。至此，数学系的“批林批孔”运动告一段落。

在3月26日，数学系召开“彻底批判林彪‘克己复礼’反革命纲领”大会，我作了题为《要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促进派，不做资产阶级复辟的卫道士》的表态性发言。总支书记对我的这个发言给以肯定，表扬我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是“促进派”。可还是这位领导却在一些人中又说：“数学系十几年没有发展党员，发展了一个是啥人？”但不管如何，在这几个月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没有点名批判我，我还算“幸运”。当然，也只是没有点名而已。

二十一、“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

自1966年起，全国高校就停止了招生。1972年秋，实行高招“革命”，地方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1973年秋，我担任数学系73级（第二届工农兵学员）一班《数学分析》课的主讲教学工作；1974年春，73级两个班的《数学分析》课合班上。

1974年5月至7月，数学系8名教师、干部，随73级学员赴洛阳开门办学。由于学员对我的谅解和对我做教学工作的支持，我感到有力量，就满怀信心地投入这一活动。到洛阳不久，根据我已往的经验，向领导小组提出建议：工作是不是安排得再紧凑些？这一下坏了，质问我：该怎么紧凑？并且据此在7月份总结时，说我“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指责。”

在一天晚上，教师干部研究工作的会上，我针对某些说法，提出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我说：政治要统帅业务，要保证业务，而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政治的统帅作用是自始至终的，不能和业务轮流突出；接受再教育要贯彻开门办学的全过程，不能说这一段以接受再教育为主，下一段以搞业务为主。我又根据我们小组所在车间的几个班组，每天干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天任务、闲余时间较多的情况，提出了是否可以组织学员向工人师傅学习工厂常用量具的

测量方法，研究其数学原理的建议。对此，一位先生当即批判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不把接受再教育放在首位”，“否定拖厂的批林批孔运动”（因为拖厂是批林批孔先进单位，我却说有些班组闲余时间较多，没事干）。我不让步，据理争辩，其他教师也支持我的建议。参加我们讨论的一班学员代表贺双锁，当场表示不赞成对我的批判，二班学员代表刘黎明，在会后找我谈心，表示对我的支持。

6月，抽调一部分学员分成6个小组，学员任组长，每组一名教师指导，到几个工厂调查生产中所用的数学问题。我所在的小组调查的问题最多，不仅有初等数学问题，还有高等数学问题，学员都解了出来。领导组决定，每组推举一名学员，在全体会上讲一个典型问题，可就不让我所在的小组讲。我和领导组负责人之一理论：“为什么不让我们小组讲？如果认为我有错误，难道还要株连我所在小组的工农兵学员不成？”对方理屈，只好答应要求。结果，我们组的丁俊山讲的效果最好。贺双锁大声说：“丁俊山给调查组争了光！”（实际上是指给我们小组争了光。）

7月初，开门办学结束时，开了总结会。领导组在总结报告中，把我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用突出的篇幅写了进去，只是没有点我的名字，因为点名批判须经上级批准。又让一位和我不在一个车间、且因病来洛阳很晚、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二班干部，在总结大会上对我进行批判。总结报告和这位班干部都把一个学员说的，而且是最先受到我的批评的“搬搬抬抬没有什么意思”这句话，硬加在我的头上。他们说我“破坏开门办学”，是“跳梁小丑”，是“八年一贯制”的“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和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有什么两样？”等等。我坐在会场最后，一班的几个干部和我坐在一起。他们在听到总结报告中批判我时，就开始大声说话，我还制止他们几次。在那位班干部发言专门批判我时，他们就像疯了似的，大声嚷嚷，并把纸扇点着在空中摇。

我本来打算第二天打扫完卫生、还还借的铺板，和大家一起乘火车到偃师下车。会议这样一开，我改变了主意：一散会，就打行李，交给一位学员请他给带到开封，立刻走人。在洛阳火车站碰到了十几位提前回家的学员，其中有二班班长，他问我：“刘老师，今天大会这样对待你，你就能忍得住？”我说：“我面对的是近百名学员啊！如果只我们教师在一起，那我就要和他们理论理论。”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